

•智库要闻•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赵金松一行来校调研 省重点培育智库东吴智库建设情况并召开座谈会

6月29日下午,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赵金松一行来校调研省重点培育智库东吴智库建设情况并召开座谈会。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省新型智库建设办公室主任许益军,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副主任汪桥红、调研员周丽参加调研。我校党委书记江涌、副校长张晓宏、东吴智库健康产业方向首席专家王家宏、人文社会科学处处长于毓蓝、东吴智库执行院长段进军等陪同调研。座谈会由副校长张晓宏主持。

座谈会上,江涌书记首先致欢迎辞。他对赵金松副部长长期以来对苏州大学和东吴智库的关心与支持表示感谢。随后,江涌书记简要介绍了学校在学科发展、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基本情况,着重汇报了我校近年来在加强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和推进东吴智库建设方面的总体做法。

许益军主任通报了省重点培育智库三年建设期考评情况。他充分肯定了东吴智库在咨政建言、舆论引导、服务地方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同时从智库定位提升、专业方向凝练、高质量成果产出、智库团队打造、信息化建设推进等方面提出建设要求。会上,与会人员就高校智库建设中遇到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赵金松副部长对东吴智库起步较早、机制灵活、与地方联系紧密等特点予以充



分肯定。

他强调,一是以更高站位提升智库定位,学校应当凝聚合力,主动作为,举全校之力打造东吴智库品牌,将智库建设充分融入学校“双一流”建设中来,助力东吴智库早日晋级江苏省重点智库;

二是以更宽视野拓宽智库研究,应充分发挥苏大学科齐全、研究基础雄厚这一比较优势,立足苏南经济先发地区这一实践优势,主动开展前瞻性、储备性政策研究;

三是以更强整合拓展智库资源,加强智库专职研究员团队建设,构建高水平、专业化、有梯度的智库人才队伍;

四是以更好机制优化智库治理,在选题规划、人才引进、团队建设、成果评估、智政互动等方面先行先试,探索开放式、创新型智库治理体制机制,为全省新型智库建设提供先行经验。

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省新型智库建设办公室相关同志,东吴智库研究员,人文社会科学处相关同志参加调研。

东吴智库召开发展研讨会

为进一步落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赵金松调研东吴智库会议精神,根据分管领导张晓宏副校长的工作要求,7月10日下午,东吴智库发展研讨会在天赐庄校区举行。东吴智库生态文明方向首席专家方世南、健康产业方向首席专家王家宏,人文社会科学处处长于毓蓝、副处长徐维英、陈一,多位东吴智库研究员参加交流

与研讨。东吴智库执行院长段进军主持研讨会。

于毓蓝处长传达了张晓宏副校长关于智库工作推进思路,强调智库的主要功能是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东吴智库要将苏大特色和优势学科研究方向,与苏州这一先发地区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先进经验有机结合,凝练

成“苏州方案”并扩展到全中国乃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会上,各位专家就东吴智库发展目标定位、体制机制建设、成果报送渠道、成果转化机制等方面展开深入交流。首席专家方世南教授提出要“远交近攻”提高智库影响力,一方面放眼全国,把贫困落后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和成果转化的重要

•智库要闻•



场所，整合智力资源，创新治理思路，实现智力扶贫；另一方面以“十四五”规划为抓手，深耕苏州，瞄准基层，打造区域特色，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首席专家王家宏教授从特色优势、品牌建设、体制机制等方面深入剖析智库发展路径。一是东吴智库要拿出拳头产品，让江苏经验、江苏方案在长三角脱颖而出，进而向全国传递；二是立足苏大，充分发挥综合性学科优势，将东吴智库打造成为协同创新、合作共赢的综合开放平台；三是建立健全东吴智库开放式平台运行的体制机制，重视人才引进，重大项目培育，提高智库吸引力，进一步推动智库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随后，与会专家就智库人才培养、学科交叉研究、成果转化与推介、智库“十四五”规划编制等方面开展了深入交流和讨论。

东吴智库将以本次发展研讨会为契机，进一步凝心聚力、奋楫前行，努力建设成为连接苏州、江苏与全球创新体系的“桥头堡”，汇聚一流创新人才、培育一流创新成果的“蓄水池”，促进人力资源整合与优化的“旋转门”。

“国家重大战略背景下的中原都市圈建设” 第五期东吴智库思享汇成功举办

7 月 29 日上午，第五期东吴智库思享汇在天赐庄校区红楼会议中心 201 会议室举行。本期思享汇由著名区域经济学家、河南大学资深教授、中原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耿明斋教授担任主讲嘉宾。思享汇由东吴智库执行院长段进军教授主持。

本期思享汇，耿明斋教授围绕“国家重大战略背景下的中原都市圈建设”，从文明转型与农业大省的困扰、中原都市圈建设和发展的历程以及国家重大战略特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格局中河南的地位和未来发展方向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地分析。

耿教授认为，传统农耕文明被现代工业文明吸纳、替代和改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最突出的特征。近二十年以来，伴随着河南省“三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不断推进，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都市圈在国家经济发展空间架构中的地位正逐渐提升，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已成为五大国家重大战略之一。耿教授对比了长三角

和中原都市圈的发展差异，提出要借鉴长三角一体化的经验，通过提升创新能力来推动中原都市圈的发展。

耿明斋教授长期以来持续跟踪研究中原都市圈的发展，具有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本次报告深入浅出，运用大量的数字和案例对目前中原都市

圈建设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报告结束后，与会师生就建设中原都市圈和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等相关问题与耿教授作了进一步探讨，执行院长段进军教授与耿明斋教授就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东吴智库与中原经济发展研究院的合作达成新的共识。



•智库要闻•

东吴智库首席专家方世南教授应用研究成果 “双凤党建质量指标体系”获学习强国推介



太仓市双凤镇自 2019 年发布全国第一个农村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双凤镇农村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评价办法（试行）》以下简称“指标体系”）以来，充分发挥指标体系的指挥棒作用，引导各基层党组织强考核、建载体、推项目、创品牌，把党建工作融入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党建高质量引领，保障全镇经济社会发展高质量。

坚持标准化考核

双凤镇始终注重在基层党建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积极探索，发布的指标体系涵盖村、社区、“两新”和机关站所四种类型党组织，科学设置 7 个一级主体指标，下设 26 个二级指标，细分 90 个三级指标，并于 2020 年 4 月完成首次考核测评。双凤镇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为抓好指标体系的考核，从双凤镇相关职能部门抽调业务骨干，组成考评小组，开展考评工作专项培训，统一考评标准，确保考评质量。考评小组通过实地考察、查阅资料、问卷调查、座谈随访等方式，提出基础考核意见。在此基础上，结合职能部门意见，报镇党委讨论通过，形成综合考核结论。

实施项目化推进

农村强不强，关键看“头羊”。双凤镇突出抓好基层党建“书记项目”，坚持问题导向“选题”，示范引领“答题”，推动全镇形成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向中心聚焦、为大局聚力的良好氛围。双凤镇推行“书记项目”三年来，坚持书记牵头抓

总、党员示范带动、群众协调配合机制，以切口小、重实效为原则，制定实施了社会治理、基层党建、便民服务、美丽乡村等书记项目 72 个，切实做好群众关心的小事、惠及民生的好事、利于长远的实事。凤中村“新时代志愿服务 365”项目通过党员干部主动认领党员先锋岗，示范带动村民小组长、青年志愿者在村庄治理、乡风文明等方面积极开展志愿服务，助力全村实现乡村振兴。

创新载体化建设

党员群众的需求在哪里，服务阵地就建在哪里。

一、是全面提升“有形阵地”覆盖。2019 年，在双凤镇各村、片、站、企广泛推进各类党群阵地建设，共计投入 2000 多万元建设阵地 2 万多平方米，建成江苏省首个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纪法教育基地，建成太仓市首家镇级党群服务中心、首个初心智慧学堂，建成镇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创新建设“廉情工作室”。

二、是充分发挥“行动支部”作用。双凤镇组建“绿水蓝天”“服务经济”等行动支部 27 个，结合“5+X”主题党日，围绕环境整治、项目服务、民生实事等方面，让党员身份在一线闪亮、作用在一线发挥。在疫情防控期间，“服务经济”行动支部深入经济建设第一线，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太仓欧美绿色制造产业园项目作为双凤镇招引欧美项目的重要载体，行动支部的党员们强化责任担当精神，发扬不怕吃苦、连续作战的作风，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通过前期发布《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工地复（开）工的通知》，工地自评、申请复工、现

场审核、政府备案等一系列流程严格复工程序。同时督促各施工单位做好工地每日体温测量、消杀、防疫交底、宣传等信息登记工作，组织工地有序复工，复工率达 100%。

三、是突出品牌化提升。通过提炼基层党建工作中的经验做法，进一步提升党建工作水平，把党建引领力转化为发展硬实力。积极做亮“福地红盟”品牌，完善与常熟周市、支塘“三地党建联盟”以及和海门常乐“跨江联盟”机制，推进“福地红盟”党建共同体建设。持续推进党建工作“一村一品”“一社一品”“一企一品”建设，带动实现在现代农业、基层治理等更大范围的品牌化建设。双凤镇黄桥村党委依托“党建引领，四轮驱动”品牌，深入开展“彩虹桥”党员志愿服务项目，在“红色纽带桥”推动下，与太仓法院制定“法官+村官”共建计划，开设“法律大讲堂”，通过精准结对，业务互补，在村级事务处理上强化沟通，提升村干部依法治理的能力；和勤力村党委携手，发动青年党员志愿者编排《红色力量，鼓韵乡村》创作节目，提振了农村精气神，弘扬了社会正能量；联合医院、社工组织、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土所等党员志愿者们结合中秋、重阳等节日，面向村民群众开展点对点服务，真正发挥了红色志愿者引领、服务和促进作用，不断做大、做强党建红盟“朋友圈”，凝聚了乡村振兴“最强合力”。



• 专家视点 •

深刻领悟“六稳”“六保”的基本特征

方世南

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六稳”和“六保”是一个有着丰富价值诉求、辩证互动的有机整体，具有求实性、整体性、互动性、价值性等多方面的基本特征，深刻领悟这些基本特征，对于我们沉稳而积极地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坚定发展信心，增强发展动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保促稳，以稳助保，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六稳”和“六保”的求实性特征

求实性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从客观实际出发的认识论，坚持客观实际第一性，主观认识第二性，坚持实事求是。求实性是“六稳”和“六保”最为显著的特征。实事求是党的思想路线和根本工作方法，也是政府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导和根本工作方法。只有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才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也才能在实践中贯彻落实好这些路线、方针和政策。

“六稳”和“六保”的求实性特征有两大显著表现。一方面，“六稳”和“六保”充分反映了当前的客观实际情况，是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客观实际出发提出的重大方略。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风险社会理论的创始人德国思想家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全球风险社会”已经来临。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世所罕见。全球经济何时复苏，难以预测。在此情况下，设置经济增速具体目标，无论是过高目标还是较低的目标，实际意义都不大。另一方面，“六稳”和“六保”是针对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的根本应对之策，注重解决问题并取得良好实际效果的实效性。“六稳”和“六保”充满了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设置了问题域和对策域，是克服当前重大困难的战略思维和底线思维

的有机结合。由于疫情冲击的持续时间和强度存在着显著不确定性，经济活动回升，特别是外贸、外资、产业链供应链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全世界疫情防控结果，因此，坚持“六稳”和“六保”方略，完全符合当前的客观实际。

“六稳”和“六保”的整体性特征

马克思主义将人类社会看作是各个要素交互作用所构成的统一有机整体。在这个有机整体中，社会活动的主体与客体、经济政治与文化、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等诸多因素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内在关系。“六稳”和“六保”充分体现了在稳定协调中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特征。

“六稳”和“六保”一共十二个方面，从表象看，主要涉及工业、农业、外贸、金融、市场、管理等具体行业和主管部门，但是，从社会有机体的整体性高度看，“六稳”和“六保”这十二个方面是环环紧扣，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一方面，“六稳”和“六保”这十二个方面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稳步协调发展的整体性，这十二个方面稳住了、保住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这个有机整体就稳住了、保住了。另一方面，“六稳”和“六保”也不是各管各的条块分割关系，而是具有内在紧密联系的辩证关系。因此，只有将“六稳”和“六保”有机贯穿和渗透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才能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稳定的全局和全局，实现提质增效和稳中求进的发展目标。

“六稳”和“六保”的互动性特征

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建立在对社会有机体在辩证互动中推动社会发展的认识基础上。深刻领悟“六稳”和“六保”的互动性特征，更能把握好、贯彻落实好“六稳”和“六保”中的各项任务。

“六稳”和“六保”的互动性特征突出表现为：一方面，“六稳”是“六保”的重要

前提和基础。“六稳”推动和促进“六保”，只有做好保居民就业，才能实现稳就业，只有做好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才能实现稳投资，只有通过保产业链供应链，才能实现稳外资、稳外贸，等等。另一方面，“六保”是“六稳”的工作任务和基本底线。“六保”推动实现“六稳”。只有做好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任务，才能实现“六稳”的目标。因此，坚持“六稳”和“六保”的辩证互动，发挥好“六稳”和“六保”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关系，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和践行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六稳”和“六保”的价值性特征

马克思主义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始终都置于价值论视角考察，揭示经济社会发展背后的价值诉求、价值目标和价值愿景。只有深刻领悟“六稳”和“六保”的深厚价值性特征，才能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政治使命和政治担当努力做好“六稳”和“六保”工作。

“六稳”和“六保”的价值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紧密联系的方面。一是具有鲜明的价值诉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有机统一，通过稳住经济的基本盘，兜住兜牢基本民生底线，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六稳”和“六保”列在第一项的都是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保住了就业，就能够保住基本民生，并有助于其他各项工作的开展。二是具有鲜明的价值目标。把“六稳”和“六保”统一于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保促稳，以稳助保，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三是具有鲜明的价值愿景。“六稳”和“六保”充分显示了当代中国人民战胜任何风险挑战的坚定意志和能力，一定能够确保在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基础上，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价值愿景。

• 专家视点 •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找准发力点 太仓“双凤实践”如何亮特色？

方世南

太仓市双凤镇自 2018 年 9 月制订《“党建红镇”三年行动计划》以来，围绕党建红镇、工业强镇、科技兴镇、文化亮镇、生态美镇、富民立镇“六位一体”建设，将党建品牌、党建品质、党建品位相统一，将基层党建作为引领整体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促进社会治理不断向基层延伸，切实解决民生重点问题。2019 年 3 月又创新性的发布了全国首个《双凤镇农村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针对村、社区、企业、机关站所分别制定特色化考核指标，从政治性、规范性、功能性、效率性、稳定性、创新性、发展性七个方面进行测评，不断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在有效推动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向深处、细处、优处走的过程中，促进了基层党建和社会治理在互动中双向发展。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向深处走

深处强调了社会治理的深度，要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要关注人民群众最深层的利益需求，畅通和规范群众利益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的通道，通过党群互动、政社互动、有效协商等方式，坚持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皇冠（太仓）胶粘制品有限公司党支部针对公司人才发展需求，成立“培养先锋人才”专项行动小组，通过建立后备人才库、开展轮岗实训、导师结对培训、项目式培

训的步骤，既培养了员工专业技能，也为企业长远发展储备人才队伍；湖川桥社区党支部积极开展党建带社建，党员志愿者走进居民家中，鼓励和帮助居民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人人参与，以“我楼道我管理”的楼道微管理模式，进行楼道杂物、垃圾整治，有效提高社区治理服务工作水平；新湖村支部党员带头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整治，深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发放入户宣传册约 400 份，线索排摸 11 次，整治人棚混居 14 个，清理乱堆放物品 89 处，清运建筑垃圾 300 多吨，流转土地 130 亩等，通过党员志愿服务，引领乡村特色农业、生态治理、乡风文明等方面整体推进。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向细处走

细处反映了社会治理的精细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强调基层在社会治理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将治理服务和资源落实到基层党组织，可以第一时间全面掌握群众诉求，有助于促进党群融合、治理融合和政社融合。双凤镇新湖村党委通过“专业化队伍走访”“固定化时间上门”“贴心化周末服务”“集中化问题‘会诊’”等精准服务，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切实把将矛盾易发的动迁工程办成百姓安心的幸福工程；凤雅社区党支部创新推行“红色清单促融合”工作法，将党员日常走访、廉情监督员接待反馈问题的“日清单”，社会组织、社区按周上报的需求“周清单”，廉情监督群、法润

民生群等工作群中反映问题的“群清单”进行汇总、整合，形成“居民需求清单”，及时接单处理，在精细化服务中有效保障居民需求；黄桥村党委根据“彩虹桥”党员志愿服务项目，制定三年项目规划，明确每年的重点任务，2018 年主要开展“263 整治”“331 整治”以及乡风文明建设，2019 年则围绕三星级康居点建设、人居环境整治，区域党建融合发展等工作，2020 年重点开展精准扶贫及全面扶贫，提高群众满意率；凤中村党委将党建项目与乡村整治相结合，组建五个不同专长、不同领域、不同服务对象、不同服务目标的志愿服务队，从不同方面推动治理工作取得成效。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向优处走

优处体现了社会治理的品质，不仅强调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品质社会治理，也突出社会治理要坚持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导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从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阐明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向优处走的方向。太仓市双凤社保所党支部紧紧围绕社会治理目标，建立“三办服务制”，对群众亟须解决的问题“马上办”，对热点难点问题“主动办”，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问题“透明办”，全面实现首问负责制和一次性告知制，既方便了人民群众，也提升了窗口服务工作质量；新苑社区党支部结合社区实际，建立残疾人之家，分为助餐区、活动室、辅助性就业、休息室、康复室、卫生间六大功能区，并联合社工组建志愿服务队伍，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提供残疾人就业指导 and 岗位，大大提高了残疾人生活质量；建管所党支部积极开展“党建引领美丽乡村建设再升级”项目，将长效管理工作与农户自我管理相结合，收集多方建议和意见，群策群力，同时安排专人负责点位的保洁、维护、监察，杜绝美丽乡村点位建成后“无人管”的现象发生，实现村庄环境常态化和长效化管理。



·专家视点·

以党建质量指标体系引领整体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践

方世南

太仓市双凤镇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总要求，以加强基层组织力为重点推动党建高质量发展。从 2018 年 9 月制订《“党建红镇”三年行动计划》以来，围绕党建红镇、工业强镇、科技兴镇、文化亮镇、生态美镇、富民立镇“六位一体”建设，将基层党建作为引领整体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推动力。2019 年 9 月 25 日，太仓市双凤镇发布了《双凤镇农村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在基层党建理论和实践方面作出了积极探索与创新，以党建高质量引领发展高质量。该指标体系也是全国第一个农村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2020 年 4 月，进行了全面的测评和总结，取得了显著成效。围绕以党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引领整体高质量发展这个总体目标，指标体系着力解决了农村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做什么、怎么做、做好的目的是什么这三大突出问题。

一、指标体系明确了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做什么的问题

太仓市双凤镇农村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精神，按照切实增强基层党建工作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阵地意识并以此推进整体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指标体系分为村、社区、两新组织和机关站所四大类别，每种类别设置七个一级主体指标（政治性、规范性、功能性、效率性、稳定性、创新性、发展性），下设 26 个不同种类的二级指标（例如政治学习、队伍建设、阵地建设、决策机制、经费保障、创先争优、满意程度等），细分 90 个三级具体应用指标。在指标体系中，每一项考核指标都有着客观统一的评价标准。测评方式采用实地考察、材料审核（网上审核）、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将自查、专家考查、第三方检查等形式结合起来，实地考察注重对硬件及管理的动态性评价，材料审核（网上审核）则注重工作的完整性、整体性及工作项目信息化要求的评价。形成了村、社区、企业、机关站所四种类别党组织的考核得分，再选取一定样本，赋予

一定权重，生成党建高质量发展指数。通过对指数的整理和分析，结合党建理论和群众诉求，对每一项指标进行动态调整，使其公平且比较如实的反映基层党组织质量要求，为下阶段双凤镇党建工作提供参考和遵循。指标体系不仅清楚地规定了基层党组织、党政主管部门和党员干部的责任主体，明确了考核对象，以指标的形式量化了考核内容，将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内容具体化、明晰化，也把党建工作列入党委督查工作范围，考核结果纳入干部信息大数据库，一方面有助于严格落实基层党建主体责任，促进基层党建工作成效提升以及发挥考核的指挥棒作用，另一方面在考核、任用干部时，有助于听取党委督查部门的意见，做到考察干部考党建、任用干部看党建，有效调动起各级党政一把手抓基层党建质量工作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普遍反映，农村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指明了党建高质量发展做什么的问题，既上接了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和一着不让地抓党建的基本要求，又下接了本地党建工作的具体实践，有助于根据基层党建工作的基本要求，发挥主体能动性，高质量地推进基层党建工作。

二、指标体系明确了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怎么做的问题

双凤镇基层党建指标体系以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怎么做作为价值诉求，引导基层党组织注重把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紧密融合起来，不是仅仅针对基层党建规范性的制度落实，而是将党建与经济发展、乡风文明、社会治理、环境整治、疫情防控等各方面同向发力，统筹高质量发展，不仅有助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在基层落地生根，有效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为执政党固本强根奠定深厚基础，而且也有助于促进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自觉地围绕指标体系明方向，补短板，强弱项，促进自身能力素质提高，创新性地开展工作。

基层党建工作如何高质量发展，如何通过创造性工作，激发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内生动力，使党建工作融入经济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实效，指标体系从可量化的角度提供了可操作性的工作方法，规范和引导着人们如何做好各项工作。从整体来看，每一项考核指标都能紧密结合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实际需要，既有整体性，又有针对性，不搞大而全，不提不切实际的口号和目标，坚持基层党建质量导向、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所有考核指标都有现实依据，可以经过努力完成。同时，指标设计时又充分考虑党建引领整体性高质量发展的特点，设立更高的奋斗目标，需要基层党组织用心用力才能实现目标，又体现了质量强党的要求。指标体系将村、社区、两新组织、机关站所分别制定特色化考核指标 100 项，基础分 100 分，构成百项指标、百分考核的“双百考核”机制。双凤镇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对各类农村基层党组织进行业务指导，对党建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进行评价，有的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价，评价结果纳入相关考评，并根据工作推进情况修订完善。以村为例，指标体系首先是政治性一级指标，下分政治学习、意识形态和主题教育三个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则是体现具体分值的操作办法，包括支部书记带头上党课次数，村党组织班子全年学习次数，意识形态领域分析研判会如何召开以及要解决哪些突出问题，如何组织党员参加党性教育，参与率的基本要求等等。在规范性指标中，分设队伍建设、组织生活和队伍管理等内容，并对村党组织领导班子每年召开组织生活会，流动党员每年向流出地党组织汇报情况等等进行了规范。其他 5 个一级指标同样有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则体现了具体的操作考核内容，每一个指标环环相扣，内容具体，简单易行，为党组织如何加强政治建设、阵地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提供了操作方法，确保党建高质量发展能按照具体项目要求实打实地推进。

三、指标体系明确了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做好的目的是什么问题

双凤镇基层党建高质量指标体系具有鲜明的价值诉求和目的导向，指标体系

• 专家视点 •

以人民满意为价值取向和根本目的。指标体系不是为测评而测评，为考核而考核，更不是注重在形式上做文章，而是将测评和考核作为手段，注重在内容上狠下功夫，把科学主义倡导的工具理性与人文主义倡导的价值理性有机结合起来，既注重数据、重事实、重经验材料，重定量分析，又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党员、老百姓对党的建设的总体要求，注重对党群关系和谐度、执行力建设的力度、党员素质的提升度等进行引

导，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指标体系不是管理约束人的硬性数字，而是起软性的引领作用，通过发挥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体性、能动性，推动党建工作创新性发展。在指标体系中，不论是村、社区、两新组织还是机关站所，每一项指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人民利益，在一级发展性指标中，都有满意程度的二级指标，通过党员满意度测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满意度测评、群众满意度测评，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根据得分排名划分等

次，实时反映人民诉求，推动党组织工作调整完善，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同时，体系中设定的二级指标，虽然内容有所不同，但无论是考核公共服务、产业振兴、文明建设、生态治理，还是人才储备、科技发展等，都是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最紧要的位置，从多方面保障人民美好生活水平，有效发挥党建凝聚民心的作用。

让“姑苏八点半”育新机、开新局

李兰芬

“姑苏八点半”是转新冠肺炎疫情之“危”为“机”，在品牌中育新机、开新局，推动新时代苏州由高速度发展标兵向高质量发展标杆攀登的品牌性战略。

“姑苏八点半”，是一个文化、地域、历史、现实等辨识度极高的品牌命名。品牌作为一个城市文明进步的标识，绝对不只是赋予企业商标的事情那么简单，也不只是商标注册权不被侵犯的事情那么明了。作为城市形象的品牌必须在与人的生活、社会的秩序、自然的生态及其时代发展方位的关系中才能深度彰显其理念意义。

诞生于疫情之下的“姑苏八点半”，其品牌意义的想象空间究竟有多大？又正在或可能孕育哪些发展新机遇、新动能、新格局？这既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实课题，也有一个需要实践的探究过程。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比任何时候都能更清晰地感受到，“市井烟火气”才是一个城市文明的灵魂和活力。

“姑苏八点半”品牌的打响，是转新冠肺炎疫情之“危”为“机”，在品牌中育新机、开新局，推动新时代苏州由高速度发展标兵向高质量发展标杆攀登的品牌性战略。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核酸检测是人类抗疫新冠病毒的硬核工具，但当“防控疫情”成为常态化的形势下，畅通社会沟通、愉悦心理能力、丰富营养结构、增强人体免疫等，都将升格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核心议题。因此，重塑人们的消费理念、消费信心、消费场域和消费价值链体系，就必将成为城市文明发展的常态化使命。

品牌的本意是一种对具象物品、事件或地域的命名，以启发人们对给定物品、

事件或地域的辨识和认同。随着社会变迁，品牌的应用范围愈益广泛，逐渐成为社会系统内指称“好的”“可信任的”或“典型的”同义词性。“姑苏八点半”，作为一个蕴含经济、政治、社会、治理等多重内涵的复合性品牌命题的核心要义是，立足防控疫情进入常态化的新节点，瞄准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以“夜食、夜购、夜秀、夜游、夜娱、夜宿”等接地气的新理念、新样态、新方向，搭建新行业、新动能和新格局，以促进夜经济的人民性、集聚性和引领性。从深层次上说，“姑苏八点半”是一个优化人们生存、生活、生命质量的城市品牌系统。

育新机、开新局，作为“姑苏八点半”品牌功能何以可能？如何考量？这是一个动态的、递进的社会历史性话题，需要我们以全面、辩证、开放的发展思维来审视。首先，“姑苏八点半”作为启动夜经“济”的“热引擎”，成功突围了新冠肺炎疫情滋生的消费“隔离墙”。

回应社会关切，坚持问题导向，搭建消费场域，驱动消费需求，提振消费信心，优化消费服务，引领消费方向，已成为“姑苏八点半”契合常态化防控疫情时代的品牌新机

和品牌新局的价值诉求图。其次，“姑苏八点半”成功搭建了供“给—需求价值链—一体化的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消费“无小事”，一碗馄饨、一碗面，都是事关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大事。苏“惠”十条举措的出台，“无理由退货”资金池的设立，线下购物无理由退货政策服务的启动，为更高质量、更健康、更安全的夜经济活动，打造了既充满活力又规范有序的治理“组合拳”。

第三，依托“夜食、夜购、夜秀、夜游、夜娱、夜宿”消费模式、生活方式的主题化“姑苏八点半”，赋予“人间天堂”美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示范区新的增长点与兴奋点，同时也是赋予了“现代国际大都市、美丽幸福新天堂”建设可预期的发展蓝图。简言之，承载育新机、开新局使命的“姑苏八点半”，是一个需要“跳出消费”来驱动消费，才能做大做强品牌战略工程。



·专家视点·

破解开发区活力减弱难题

钱振明 钱梦璐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一批开发区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率先突破旧体制束缚,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管理体制,大力推动经济发展,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排头兵。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是开发区的活力之源,正是这种源源不断的动力,让开发区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发挥了“增长极”作用。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开发区面临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新挑战,应以体制机制再造,激发开发区活力和创新动力。

精简高效的体制优势曾经是开发区最鲜明的特点,在发展过程中,一些内在矛盾随开发区的发展而日益突出,体制优势正在逐步弱化。开发区建设之初,经济发展的目标要求管委会具有较强的经济管理能力,而面对国际化的市场环境,又必须强化市场机制的功能,这使开发区管理处于一种矛盾复杂的境地。为与国际接轨而创建的新体制,在有些方面与国内实际不能无缝衔接,主要表现在开发区管委会在社会事务管理中的主体资格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等。管委会在实际运作中成为所在城市管辖下的一般行政区,使得开发区作为特殊经济区域所应有的管理权限范围比较模糊。为对应上级政府及其部门,管委会又成立相应机构并增加工作人员,实现上下对口,导致开发区管理机构逐步膨胀,体制优势逐步弱化在所难免。

开发区社会管理职责与能力之间的矛盾,是开发区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开发区建立之初的主要职能是土地开发和招商引资,后来逐步增加了企业服务、环境治理等。随着开发区经济开发的推进和空间规模的扩大,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治安等社会公共事务也愈益增多。增加的社会管理职能需要相应的机构承担,开发区管理机构趋于庞大,精简高效的体制难以保持。同时,随着开发区社会管理事务增多,法治问题也更加突出。

职能分离:疏解开发区社会管理负担

开发区日趋繁杂的社会管理职能不可避免降低了开发区的活力,解决的出

路在于分离开发区的双重职能,促进社会管理职能转移。经济技术开发及其宏观调控仍由开发区管委会承担,社会事务管理职能则可由行政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分担,招商引资等微观的、更多属于企业的职能可以由企业性质的开发公司承担。

发展非政府组织来分担原来由开发区管理机构承担的部分社会事务管理职能,是国内外一些开发区的成功经验。硅谷作为一个高科技企业集聚的开发园区,并没有统一的承担硅谷区域内社会事务管理的专门机构。由于其产业的主要承载地分属 6 个县的 17 个市、镇,作为一个经济区域的硅谷本身没有繁杂的社会事务管理职能,区域内住房、交通、环境、教育等公共问题由分属不同行政区的市、镇政府与包括社区组织在内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协同解决。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共担社会管理,是硅谷创新活力持续迸发的重要原因。新加坡裕廊开发区将开发建设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实行分离。裕廊镇管理局负责裕廊开发区的规划、建设和招商,区内的社会管理分别由法定机构人民协会、类似于地方行政机构的市镇理事会和作为社区组织的居民委员会等承担。上海浦东新区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引入“业界共治”做法,探索多方参与的管理体制与治理机制。

区政合一:探索开发区与行政区域融合发展

区政合一,即开发区与行政区融合,使原本由开发区管委会承担的社会管理职能合法化。一些地方的探索实践表明,区政合一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开发区与所在行政区进行职能和机构整合;开发区整体托管于临近行政区,实现开发区与行政区统一管理;开发区所在区域改设为行政区。开发区的社会管理职能由具有法定地位的一级政府行使,开发区管委会作为上一级政府派出机构,由上一级政府高位统筹和调控开发区的开发建设。这种做法有利于形成开发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优势叠加的新体制,保持开发区体制优势,化解开发区管委会社会管理主体资格问题。

开发区所在行政区政府要按照精简原则,设立必要的社会管理机构,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承担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公共服务型和社会管理型政府,不重复设置由管委会承担经济管理职能的机构,经济开发职能由管委会和其他有关组织分担。经济发达地区已开发成熟的开发区,其经济开发任务基本完成,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开发区,而是成熟的城市新区,管理职能和管理任务与一般开发区大不相同。这类开发区应根据产业发展和空间布局设立若干功能区实施再开发。如苏州工业园区为整合发展资源、优化产业导向,设立国际商务、科教创新、旅游度假等功能区,推进管理重心下移,激发体制活力。通过这种方式促进功能区管委会聚焦于规划建设、产业发展、招商引资、企业服务等,为开发区再开发增加新动能。在开发区再开发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开发公司的平台作用,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创新环境优化,提升开发区能级。

机构精简:重构专业化管理

开发区管委会要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整合归并内设机构,集中抓好经济管理和投资服务。要推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实现经济开发管理机构与开发运营企业的分离,优化开发建设。经济发达地区的开发区,可设立国有控股的企业性质的开发公司承担开发功能,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事务转由开发公司承担。上海张江科学城等一批有影响的开发区普遍采用“管委会+开发公司”的治理模式,取得很好成效。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开发区,考虑到企业性质的开发公司市场能力偏弱,可以利用行政机构调动资源能力强的优势,让管委会适度参与开发,并逐步按照政企分开原则,过渡到开发公司负责具体的开发事务,管委会仅承担开发管理的模式。管委会作为政府派出机构,负责对开发区开发建设进行宏观调控。在行政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开发公司等各种组织的机构设置上,要防止机构重叠、职能重复、工作重合,使开发区机构设置更趋专业化。

保持开发区机构的精简高效优势,

• 专家视点 •

应当建立多元参与的公共服务机制,推进公共服务外包。开发区管委会、行政区政府根据各自职能,分别确定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方向,提升公共服务购买能力。开发区在精简、优化管理机构的同时,可以推行更灵活的“编制”形式,提高管理效能。推进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优秀人才的“雇员”制,试行没有行政、事业编制的灵活编制,薪酬以岗位及其绩效为依据,解决开发区管理职能增加而人员紧缺问题,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减轻财政负担,并按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原则,逐步推进各类管理人员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

多元合作: 推进开发区治理体系优化

开发区应逐步形成多元主体共治治理状态,并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构建有效开放的治理体系。通过职能和机构的重新配置,激发开发区体制的活力。

合作治理是各类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协同处理公共事务的一种治理方式。合作治理的基础是平等、信任和互惠。建立在平等、信任、互惠基础上的合作各方主动参与、互动交流、沟通协调,是确保合作治理持续和有效的条件。推进开发区治理的政府间合作,要明确合

作各方——各类政府组织的职能定位,形成信息交流共享机制。可以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形成共识基础上的共治。若出现不利于开发区治理的严重分歧,则依靠其共同的上级政府来统筹协调。要推进绩效考核成果,促进利益共享和持续合作。

推进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的合作,依赖于政府简政放权,通过组织结构改革,摆正管委会等各类政府机构在开发区治理中的位置,明确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合作关系。非政府组织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强化参与治理的意识和自信,并完善自律和他律机制,促进治理有效性。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对苏州市生物医药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挑战与对策

王 俊

编者按: 近日,苏州市社科联、苏州
市智库办《智库专报》2020 年第 9 期刊
发布东吴智库研究员王俊教授研究成果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苏州市生物
医药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挑战与对策》。

王俊教授对《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
议》“知识产权”章节进行了解析,指出
“协议”对苏州生物医药企业知识产权保
护具有一定挑战。对此,我们应理性应对
法律重大调整,多措并举强化生物医药企
业知识产权保护。

现将全文奉上,以飨读者。

2020 年 2 月 14 日,《中美第一阶段
经贸协议》(下文简称《协议》)正式生效。
协议第一章名为“知识产权”,共十一节
36 条,就双方共同关心(其实是美国尤为
在意)的知识产权相关问题做了规定。其
中,涉及商业秘密相关内容的共 9 条,占
全部知识产权条款四分之一。此外“知识
产权”一章中,明确提到“药品”二字的条
款有 4 条,分别是“药品专利”2 条,“专
利”1 条,“假冒药品”1 条。这些条款关
系到生物医药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核心
问题,且与中国现行法律存在许多明里暗
里的差异,日后容易引起纷争。当前,全
市上下正努力把我市的生物医药产业打
造成世界级产业地标,为确保生物医药企
业的健康发展,我们必须重视《协议》生
效所带来的各种挑战。

一、《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
议》对苏州生物医药企业知识产
权保护的挑战

1. 药品专利申请补充数据制度的确
立将更利于美国药企来华申请专利。《协
议》允许药品专利权人在专利申请日后补
充数据来满足充分公开或者创造性的要
求,这是对美国药品专利制度的引进。美
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新药研制水平最高
且成果最多的国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补充数据制度”。根据该制度,一种化
合物申请药品专利时只要有充分的实验
数据(充分公开)来证明该药具有治疗某
种疾病的疗效,并且其效果不同于其他
现有化合物(创造性),即使该药品最初申
请时不是为了治疗此种疾病,也能获得
专利。世人熟知的万艾可就是典型案例,
虽然没有充分的临床试验数据证明其最
初的发明指向——治疗心绞痛具有创造
性,但是研发人员在注意到某些病人的
勃起现象后,转换了研究方向,用充分的
试验数据使其在治疗勃起障碍方面获得
了药品专利权。可以说,补充数据制度成
就了万艾可的专利权。对于善于研制新
化合物的美国药企而言,补充数据制度
可以在具备初步条件时即率

先提出申请,继而在后续研究中补充其
他方向的数据,以达到阻遏中国药企申
请专利的目的。由于美国法律对补充数
据的标准比较宽泛,《协议》生效后,美
国势必会把这一标准用于在华申请专利
的审查条件。对此,苏州生物医药企业
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2. 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的确立可
能使苏州生物医药企业仿制药面临上市
困境。所谓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实
质上就是引入了美国药品专利保护中的
专利链接制度。它要求在仿制药上市之
前的审批阶段,仿制药企业要声明被仿
原研药专利无效或仿制药并未侵犯原研
药的专利权。原研药专利权人在得知此
信息后 45 天内有权提起侵权诉讼并启动
30 个月(美国法律规定了具体期限,《协
议》没有)的遏制期,在遏制期内仿制药
的审批虽会继续,但暂不批准上市。由
于国产化学药品中 90% 以上都是仿制
药,新药



• 专家视点 •

和改良型新药都只占 4% 左右。因此,与拥有专利权的美国原研药企业相比,苏州生物医药企业的综合实力明显较弱,在此类诉讼中极易处于不利地位。原研药企业还往往在前一侵权诉讼未决时申请若干新的专利,并试图就这些专利进行新的专利侵权诉讼,从而获得新的 30 个月的遏制期。在多个遏制期叠加的情况下,原研药企业获得的遏制期远远超过 30 个月,实质上阻碍了仿制药的上市。

3. 专利有效期延长制度的确立将会大幅提升苏州生物医药企业仿制药上市成本。《协议》规定,无论是专利授权审批还是药品上市审批,如有不合理延误,则被延误的期限要在专利权期满后得到补偿,这一规定实质性延长了药品专利权 20 年的保护期限。已有研究表明,即使没有专利权保护期调整制度,每一个药品的专利有效期都足以使权利人赢得充分的利润。专利权保护期延长不仅使专利权人的独享利润得以扩大,更重要的是大幅提升了仿制药上市的时间成本,因为仿制药要在专利权期满之后才能生产上市。当然,仿制药企业也可以用金钱换时间,通过支付高额专利许可费而提前上市。无论哪一种,仿制药上市的成本增加是不可避免的。

4. 商业秘密严格保护制度的确立将使苏州生物医药企业经营管理面临考验。《协议》将商业秘密涵盖在保密商务信息范围内予以保护。保密商务信息并不是法律概念,它是指涉及或与如下情况相关的信息:任何自然人或法人的商业秘密、流程、经营、作品风格或设备,或生产、商业交易,或物流、客户信息、库存,或收入、利润、损失或费用的金额或来源,或其他具备商业价值的信息,且披露上述信息可能对持有该信息的自然人或法人的竞争地位造成损害。这种扩大性的保护极大地挑战了国内企业对商业秘密的认知,增添了与商业伙伴打交道时的风险。而《协议》对商业秘密侵权举证责任的倒置和侵权行为入刑门槛的降低,对没有足够商业秘密保护意识的自然人和法人而言更是重大的考验。《协议》同时也将电子入侵、违反保密义务等界定为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即使其并无后续的披露或使用商业秘密行为。这些全新的规定,实际上都是美国《商业秘密保护法》相关内容的体现,对国内企业界、法律界而言都是新的挑战。尽管我国 2019 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把《协议》核心条款做了类似规定,但整体而言,保护力度和水平都远不及美国。这就意味着,苏州生物医药企业今后

经营管理、引进人才方面都要特别小心,不能触及商业秘密保护的雷区。

二、理性应对法律重大调整,强化生物医药企业知识产权保护

生物医药是创新密集型产业,以药品专利为代表的各种知识产权是生物医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协议》的生效对生物医药企业发展将带来根本性的影响。推动我市生物医药企业尽快提升知识产权自我保护能力的同时,政府也应为企

业知识产权保护提供更多的支撑。

1. 全面评价知识产权保护新规,提前做好充分准备。一是要充分认识《协议》知识产权章节的重要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同国内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为充分有效保障自身的知识产权,避免卷入知识产权纷争,苏州生物医药企业有必要认真研读《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特别是要认真仔细地研读《协议》与国内现行法律不一致的条款。只有正确理解新规的内涵,才能在法律的边界内行动,并运用法律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二是要做好短期受困于《协议》的心理准备。《协议》关于药品专利权的种种规定,总体上倾向于保护原研药企业的利益。对苏州生物医药企业发展来说,短期而言存在一定不利影响,毕竟整体来说苏州生物医药企业的原创研发能力与美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我们的企业主要是以集成创新或二次创新为主,生物医药产品上市时,可能需要付出较高的时间成本或金钱成本,也有可能面临专利纠纷急剧增加的情况。因此,要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和相应的企业运营谋划。三是要确立长期会受益于《协议》的正确认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协议》对原研药专利权的立法保护,有助于倒逼苏州生物医药企业提升创新能力。苏州市政府正倾力打造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最佳营商环境,这必将为生物医药产业自主研发能力的提升带来更多可能性。只要我们拥有了相关医药产品的专利权,以《协议》为代表的相关法律规定就能让企业的独享利益得到充分的保护。因此,苏州生物医药企业要重视原研药的研制,已有原研药上市的企业更要充分利用相关制度,强化自身利益的保护。此外,仿制药企业也要善于利用专利早期纠纷解决机制,找到一条平衡仿制药和原研药利益的道路,通过与原研药专利权人达成和

解协议,或者专利许可合同,提前锁定产品上市的机会。

2. 加快普及知识产权保护新规,有效避免企业卷入法律争端。针对《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专利法修正案草案》、《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关于商业秘密保护的相关内容,要组织专题研究,提供政策指导,为企业深入浅出地介绍新规的潜在影响和企业可能需要采取的措施。还要及时跟踪学习国内外知识产权法律最新动态,特别是与生物医药产业相关的知识产权规定,经常关注并研究美国的重要知识产权案例,借鉴相关经验,有效保护苏州生物医药企业的利益。

3. 引导企业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升企业自我保护能力。一是多途径增强生物医药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比如通过各种培训、讲座等,让生物医药企业所有人员,从一线工人到高层决策者都能增强知识产权意识,学习了解知识产权法律基本知识。二是指导企业把知识产权保护作为内部规章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帮助企业从运营管理、生产销售各个环节着手,制定与完善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三是鼓励生物医药企业设立专职知识产权保护部门,配备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

人员,专门做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战略规划,完成知识产权申请手续,维护企业知识产权,进行知识产权许可或转让等活动,以维护企业的根本利益。

4. 组织知识产权保护沙龙活动,定点突破企业实践中的盲区。要有意识地帮助企业应对知识产权保护实践中常见的、共性的难题和困境,如商业秘密保护等典型问题。苏州生物医药企业很多研发人才是从美国学成归来或曾加盟创业的,企业在引进此类人才时,尤其要注意避免引发商业秘密纠纷。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企业因为对商业秘密的法律定性,往往只关注“秘密性”、“经济性”而忽略了“保密性”这个要件,结果功亏一篑,打官司十有九输。对很多中小生物医药企业而言,这可能是关乎生死的一环。因此,要帮助指导中小生物医药企业建立合理有效的商业秘密内部管理制度,包括该企业商业秘密的涉及范围、秘密级别划分、每一级秘密保管及查阅程序、涉密人员离职程序、泄密责任追究等,特别是要在员工劳动合同中列明商业秘密保护条款及竞业禁止条款。关于“秘密性”信息问题,企业要善于把客户名单等从公共信息变为商业秘密的证据留存,更要特别关注《协议》中所涉及的保密商务信息问题。

•专家视点•

着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小区治理新格局 ——枫桥街道基层小区治理“三三制”模式的探索与启示

吴新星

编者按：东吴智库吴新星研究员担任主笔撰写的决策咨询报告《着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小区治理新格局——枫桥街道基层小区治理“三三制”模式的探索与启示》，刊发于《市情研究》2020 年第 7 期。苏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徐美健对该文作出批示。

文章深入剖析了枫桥街道“三三制”基层小区治理经验的形成背景及经验做法，并提出了深层思考。文章指出，枫桥街道基层小区治理“三三制”模式，通过“三元共建”“三层共治”“三心共享”的方法，有效解决了小区治理中存在的基层党建薄弱、管理幅度过大、基层民主“空转”等问题，为全面加强基层小区党建、基层小区民主政治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作出了生动的创新实践。

现将全文转载如下，以飨读者。

近年来，苏州高新区枫桥街道始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直面基层小区治理中存在的基层党建薄弱、管理幅度过大、基层民主“空转”等问题，以西津桥社区所属富康新村小区为试点，探索实施党建引领基层小区治理的“三三制”模式，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延伸党建触角、紧贴群众需求，有力促进和带动了社区治理的深入推进。富康新村小区作为一个 1993 年建成的老小区，近年来在高新区各项专项行动、试点任务中连获“四个率先”，即：率先完成车库住人清理、率先完成违规群租清理、率先完成动迁小区车位收费改革、率先完成小区垃圾分类试点，社区美誉度和党群满意度持续提升。2020 年 3 月 28 日，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蓝绍敏一行到富康新村小区专题调研，对小区垃圾分类工作模式给予了充分肯定。

枫桥街道“三三制”基层小区治理经验的形成背景

自 2006 年街道撤村建居以来，枫桥街道党工委相继推进“中心 + 社区”、“一核多元”网格化治理、“N+X”社区治理机制等实践创新，有力推动基层社区治理水

平不断提升。但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深入、经济快速转型发展，枫桥街道下辖的基层小区面临着巨大的治理挑战。

第一，基层小区党建相对薄弱，引领社会治理的功能不足。一直以来，枫桥街道党工委高度重视基层党建工作，辖区内 7 大社区党委在基层社区治理中较好地发挥了引领作用。但基层小区治理一线，受制于小区党员构成、支部书记个人能力、小区党建资源等各个因素，客观存在着“有组织无建设”“有党员无活动”“有党性无引领”等问题，基层党支部对小区社会治理和民主建设的引领整合作用仍显不足。

第二，社区治理幅度过大，治理效能难以凸显。2006 年，枫桥街道将原先的 24 个行政村合并建制为 7 个城市社区居委会。街道辖区内的 56 个居住小区（含 26 个动迁小区、30 个商住小区）划归 7 个社区管理。每个社区平均下辖 8 个小区，西津桥社区管辖的小区也达 11 个之多，社区治理的幅度过大。加之各个社区的下辖小区在发展历史、住宅性质、人口结构等方面存在多样性，基层小区管理体制复杂、矛盾交织，社区治理面临较大挑战。

第三，小区民主制度“空转”，居民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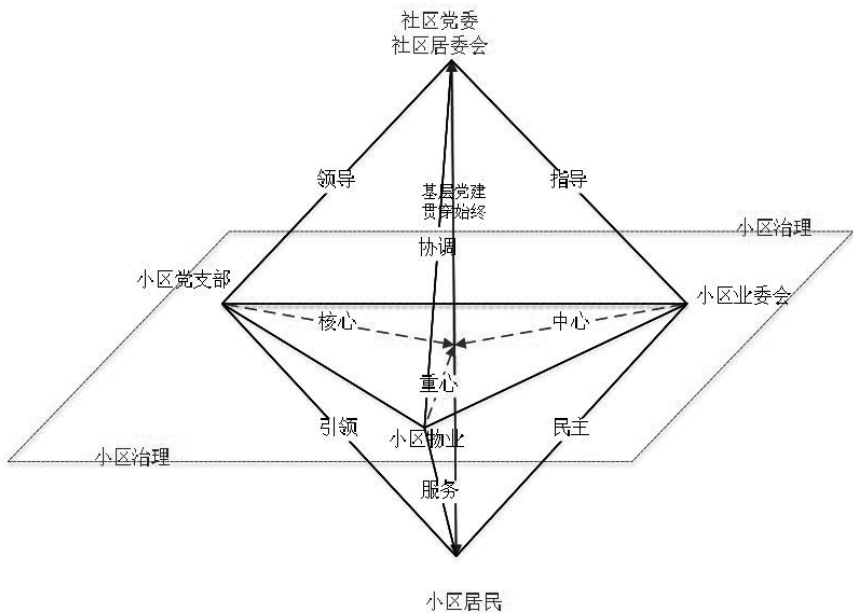
与治理的积极性不高。2004 年以来，枫桥街道按照《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严格落实基层社区民主选举制度，以社区网格为载体推进社区民主治理。但随着街道行政权力的下沉，街道下辖的大多数社区自治功能相对减弱，基层小区居民参与治理相对不足，基层小区协商民主和协同治理机制未能有效确立，小区民主政治制度普遍存在“空转”现象。

枫桥街道“三三制”基层小区治理经验的经验做法

近年来，枫桥街道立足于基层党组织的主体功能强化和基层小区民主治理的推进，以富康新村为试点，从组织制度、机制运行、监督考核等方面进行创新重塑，探索形成了党建引领基层小区治理“三三制”模式，主要包括党支部、业委会、物业“三元共建”，社区、小区、居民“三层共治”，党建、民本、服务“三心共享”三大部分内容。

（一）党支部、业委会、物业“三元共建”

作为枫桥街道最早的动迁安置和商住混合型小区，富康新村小区目前总户数为 660 户，总人口 2853 人，其中户籍人口 1280 人，外来人口 1573 人。小区党支



• 专家视点 •

部下设 4 个党小组,共 29 名党员。近两年,在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委的领导和指导下,富康小区以“党社之家”为阵地,在小区层面建立了党支部、业委会、物业公司三元融合共建的体制机制。

第一,突出支部引领,推进三元融合共建。富康新村“三元共建”模式,并非是党支部、业委会、物业之间的分离式治理,而是相互嵌入式的融合共建。在小区党支部的引领下,富康新村党支部的 7 名支部成员通过业主委员会换届选举进入小区业委会,占业委会 77.8%。业委会负责人兼任党支部副书记,党支部书记当选业委会副主任,从而形成党支部、业委会、物业公司组织互嵌;29 名党员按照楼道细分党员服务网格,分网格联合物业和业委会为小区居民提供服务,建立以党员为核心的小区治理集体行动机制。此外,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小区党支部、业委会、物业共同对小区进行安全巡查,建立常态化的三元融合共建机制,巡查过程中发现问题现场落实责任并解决问题。

第二,强化阵地建设,打造共建服务平台。“棠花红”先锋阵地建设要求,富康新村建立“党社之家”平台,作为小区党支部、业委会、物业议事服务的主要阵地。“党社之家”平台通过党员议事会与居民议事会相结合、党员教育与传统家训家风相结合、党建文化与校园企业文化相结合,促进小区党员、群众之间良性的互动,形成党支部、物业、业委会等多方融合共建集体行动的机制。同时,在西津桥社区党委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区域大党建作用,整合排定资源、需求、项目“三张清单”,有效形成了疫情防控以及各类专项整治工作合力,定期开展免费理发、电信诈骗宣传等系列惠民活动,得到了居民群众的一致好评。

第三,注重作用发挥,引领群众参与共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在于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功能发挥。富康新村的 29 名党员在支部书记夏云男的带领下,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带动小区居民参与环境改造、车位收费管理、车库整治、疫情防控、垃圾分类等工作。并广泛收集意见,凝聚居民共识,帮助解决小区治理中的各类问题。

(二)社区、小区、居民“三层共治”

富康新村“三三制”治理的贡献在于,形成了社区、小区、居民三个层面的协同共治,实现了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解、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了基层社会治理基础。

第一,强化社区组织领导,实现治理权力下沉基层一线。西津桥社区下辖 11 个小区,有动迁安置小区、商业住宅小区、动迁安置与商住混合型小区等多种类型。各个小区内的居民构成复杂,动迁农民、购房业主、租房业主等多种群体生活于同一空间,多元主体的多样化利益相互交织叠加。面对治理幅度过大、小区类型多样、群体结构复杂的情况,西津桥社区党委通过加强对小区党支部建设的领导、对业委会建设的指导两条线的强化,并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加强对物业公司的监督、协调、引导、指导,以此为核心在小区层面形成公共权力和社会权利协同共建的格局,有效地解决了基层小区治理长期存在的公共权力真空和民主治理“空转”问题。

第二,强化小区主体责任,破解基层小区治理无序难题。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社区治理的现代化,而社区治理的现代化要靠一个个基层小区治理机制创新和效能提升。富康新村在“三元融合共建”主体格局下,实施“一网一屋一品”工作机制,分网格落实党支部、业委会、物业

三类主体服务责任,以“党社之家”为阵地实施居务服务供给改革,以五类文明楼道建设为载体提高居民小区治理的参与度和参与能力,从主体、机制、评估全方面破解小区治理无序的问题。

第三,强化居民自治功能,着力打造基层治理共同体。在社区党委、居委会的指导下,富康新村按照“N+X”模式重新选举组建业主委员会。N 是固定分配的业主代表名额,X 是吸纳居住在小区内的党支部支委、街道工作干部、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作为当然业主代表加入业委会。“N+X”模式,加强了基层小区民主建设,整合了小区治理的各类资源,提高了业委会民主治理的效能。

(三)党建、民本、服务“三心共享”

枫桥街道富康小区治理模式的创新,以党建为核心、以人民为中心、以服务为重心,将党建、民本、服务三大基层治理价值,深入贯彻到街道党政干部、社区群众和社会公众心灵深处。

第一,以党建为核心,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小区治理全过程。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核心是党的领导。富康新村的小区治理模式创新,始终以加强基层党建为核心,在社区党委的领导下,优化和强化小区党支部的建设,形成以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以党员干部为基本力量,业委会、物业公司、专业社会组织、“两代表一委员”、小区居民多元主体参与的“一核多元”治理格局,并以小区“党社之家”为平台,充分发挥“楼道党小组”的功能作用,以支部带动党员,借助“党员户”挂牌等形式以党员带动家庭成员、邻居,以点带面强化小区的良善治理。

第二,以人民为中心,把人人参与作为小区治理的重要抓手。富康新村的小区治理改革,通过加强业主委员会的建设,完善了基层社区的民主政治组织机制,提高了居民参与小区治理的能力;通过网格化治理、“一楼一品”、“党社之家”等机制和载体,建立了党组织、社区组织、小区居民协同共治,人人有责、人人负责、人人享有的利益共同体。

第三,以服务为重心,把提升小区居民获得感作为小区治理的根本目标。优质居务服务的供给是基层小区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指标。富康新村通过党支部、业委会、物业共同参与的常态值班、联合巡查、惠民小屋等小区服务供给改革,解决了长期困扰小区居民的小区环境脏乱差、停车难、车库住人等问题和风险,以务实的治理创新增强了小区居民的获得感。



•专家视点•

枫桥街道“三三制”基层小区治理经验的深层思考

枫桥街道的“三三制”基层小区治理创新,是以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坚持人民至上执政理念的具体实践,对于构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的社区治理格局,推动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极其可贵的借鉴意义。

第一,“三三制”基层小区治理是全面加强基层小区党建的生动实践。“三三制”基层小区治理核心内容是加强基层小区党支部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在小区多元治理格局中确立了党支部的领导和引领地位,以党支部为战斗堡垒,以党员为先锋模范,整合小区治理多元力量,

凝聚共识,建立小区治理的集体行动机制。从富康新村的实践经验看,党支部的建设离不开具有较高党性、较强组织协调能力的支部书记的有效领导,离不开社区党员对小区事务的关心、参与和示范作用,离不开基层党组织对小区治理全过程、全方面的领导和引领。“三三制”基层小区治理以思路创新、机制优化、服务供给强化了基层小区的党组织建设,同时也提高了小区居民对党员同志的认同、肯定和信任。

第二,“三三制”基层小区治理是加强基层小区民主政治的生动实践。“三三制”基层小区治理,破解了治理幅度过大和公共权力下沉造成的基层民主自治“空转”的现实性问题。富康新村进一步优化了枫桥街道“N+X”业委会组织机制,在小

区层面建立了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参与的组织机制。同时,“三三制”基层小区治理机制建立了纵向上社区、小区、居民上下权力和权利良好互动关系,横向上党支部、业委会、物业多主体共同参与、协同共治的治理格局,从而形成了民主协商、民主治理的共同体。

第三,“三三制”基层小区治理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生动实践。“三三制”基层小区治理的价值导向是以人民为中心,创新社区居务服务供给机制,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三三制”实现了居民在小区服务供给过程中的参与、监督、检查、共享,降低了横向剥夺感,保障了安全感,提升了获得感,增强了幸福感,小区居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得到了均衡而不断充分的满足

以区域一体化发展 推动经济提质增效
对苏州、深圳、杭州经济发展对标地启示

孙陆诗雨 段进军 屠立峰

编者按:近日,《调研通报》2020 年第 36 期刊登了东吴智库执行院长段进军教授、东吴智库研究员孙陆诗雨与屠立峰的文章《以区域一体化发展 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对苏州、深圳、杭州经济发展对标地启示》。

本文按照人随产业聚散,产业发展决定城市兴衰,交通成本决定产业布局与规模经济,科技创新决定产业结构与产业质量的认知逻辑,从区域面积、地方公共预算收支情况、人力资源、金融资本、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方面对标三市经济发展的差异,梳理苏州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现将全文奉上,以飨读者。

改革开放以来,苏州、深圳、杭州三座城市(以下简称三市)经济高速发展,科技创新也取得长足进步,在全国城市经济发展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三市经济发展的路径各有千秋、各具特色,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一、三市经济发展对标找差

(一)自然禀赋方面的差异。城市区位与区域面积是城市发展的空间载体。苏州、深圳、杭州三市都具有交通便利、海

运便捷的优势,地理位置优越,基础设施完善,港口贸易发达。从区域面积方面来讲苏州、深圳、杭州面积比大约是 4:1:8,三市面积差异巨大;在工业化时代,一般认为平原是工业发展的有效面积,三市平原面积的差异更为巨大,苏州与杭州平原面积都在深圳的十倍左右,大约为 10:1:10;城市建成区面积是人们生活工作的主要区域,也是 GDP 的主要产出地,三市比例是 1:2.5:1.1。

(二)经济发展成效方面的差异。改革开放后,深圳从 1979 年设市到 1996 年,仅用了 17 年时间 GDP 就超过了苏州,其后,深圳 GDP 增长速度更为迅猛,三市 GDP 差距逐渐拉大。从 2019 年三市人均 GDP 数值来看,苏州与深圳在劳动效率上也有一定差距,苏州人均 GDP 比深圳少 2.44 万元。从单位面积上交财税收入来看,深圳是苏州的 7.3 倍,是杭州的 15.8 倍,这表明苏州经济发展主要依托于生产制造,产业的附加值比较低,处于产业微笑曲线的低端;杭州经济发展更倚重第三产业,特别是电子商务的发展;深圳的经济发展均衡而强劲,三次产业结构更合理,产业的附加值更高。这种倍数的差异不是生产效率、组织能力的问题,而是三市经济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产业领域或同一领域中不同发展环节的



问题。

(三)科技创新成效方面的差异。三市在科学技术创新的投入产出方面差距也在不断拉大,2019 年三市全社会研发投入比例是 1:1.9:0.8,深圳的研发经费投入力度更加大。深圳 PCT 专利申请量远超过杭州和苏州,占全国总申请量的 33%。深圳企业的科技创新成果已跻身世界前列,说明深圳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突出,原始创新能力强,更注重在国际市场保护自己的技术优势与合法权益。苏

• 专家视点 •

州作为制造业之都，企业 PCT 专利仅是深圳的七分之一左右，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相对较多，也仅是深圳的三分之一左右，是杭州的 1.4 倍，这充分说明了苏州发明专利更多的是在填补国内空白，创新活动主要是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绝大多数企业还不具备技术优势和国际竞争力。

（四）人力资源集聚方面差异。人口密度与流动人口数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地区信息交流的强度、信息传播的密度和资源整合的效率，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活力的重要体现，是一座城市吸引力与财富效应的标志。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窗口和新兴移民城市，巨大的财富效应吸引了大量创业的年轻人，是“最受农民工欢迎的城市”，吸引着广东北部、江西、湖南等地区丰富的人力资源，目前，深圳的人口密度要远高于苏州与杭州。杭州的省会首位度地位及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宜居环境，对全省乃至周边省份的人力资源都有巨大的吸引力而苏州的人力资源主要来源地是省内盐城、宿迁等市以及安徽、河南等地区，随着国家中部经济崛起战略实施，苏州集聚人力资源的空间还将被严重压缩；加之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五大中心建设，上海的高端技术溢出效应在减弱，对优质人力资源的虹吸效应进一步增强。从三市近十五年常住人口统计数据对比来看，2014 年后，深圳、杭州人口增长走出平台期并开始较快增长，而苏州在 2011 年后常住人口增长几乎停滞，2019 年深圳新增 41.22 万人，杭州新增 55.4 万人，苏州仅新增 2.82 万人。苏州在经济发展中对劳动力资源的集聚能力逐渐减弱，刘易斯拐点已经显现。从人口结构组成来看，苏州和杭州户籍人口较多，城市人口相对固定；深圳外来人口是户籍人口的两倍，城市人口流动性大，对人们的吸引力更强。苏州、深圳、杭州老龄人口占比分别是 25.1%:6.6%:21.3%，苏州、杭州都已经进入到国际公认的老龄人口占 20%—40% 的重度老龄化阶段，全社会抚养比高，数量型人口红利已渐行渐远。而深圳还没有进入到人口老龄化阶段，社会以年轻人为主，城市充满了朝气蓬勃的精神，涌动着探索的激情和创业的活力。

（五）集聚金融资本方面差异。苏州、深圳、杭州在集聚金融资本方面差距较大，三市的上市公司数量比 1:2.9:1.2，深圳比苏州和杭州加起来还要多。苏州的资本积聚前期主要是依托于外商投资，深圳紧邻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并建有深圳证

券交易所，各类金融机构集聚，形成了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早在 2016 年，深圳注册资本就已超过 2.7 万亿，机构数量和管理资本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杭州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居全国首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同样居全国首位，是全球最大的移动支付之城。2019 年苏州、深圳、杭州实际利用外资达比达到 1:1.8:1.5。相比之下苏州在资本集聚能力方面也处于劣势。

（六）三市交通运输能力的差异。交通是经贸发展的基础条件，流通是经贸繁荣的重要标志，三市都处于两个大湾区都市群中的关键节点位置，城市基础设施完善，商业活动基础较好。三市中，苏州无本地机场，航空出行或货运主要依托苏浙沪机场群，杭州无本地港口，海运主要依托宁波—舟山港、上海港等沪浙港口群，只有深圳是机场、港口、铁路、公路一应俱全的城市。深圳蛇口港和盐田港是两个国家级特大港口，苏州港是世界第一大内河港口，世界第十大港（含海港），苏州港吞吐量是深圳港口吞吐量的 2 倍左右，这说明苏州大宗商品生产量大，产品附加值相对较低，对交通运输费用更为敏感。

苏州、深圳、杭州三市铁路货运总量的比例是 2.5:1:4.37，公路货运总量的比例是 1:1.7:2.1，铁路和公路货运总量都是杭州最高，这说明杭州对陆路运输依赖度更高，这既与阿里巴巴及圆通、申通、中通、韵达“三通一达”等电子商务的发展相契合，也与浙江繁荣的中欧国际贸易有关；三市分别坐落在长江、珠江、钱塘江口，水路货运总量也都很大，苏州、深圳、杭州的水路货运比例是 1:5.8:1.5，说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内部微循环也很发达，但深圳的货物贸易与交流更为频繁，在区域经济中的辐射带动作用更强。

（七）公共预算与居民人均收支的差异。从三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来看，2019 年度，深圳高于苏州 1551.4 亿元，三市比是 1:1.7:0.9，深圳经济发展状况要明显好于苏州与杭州两市；从三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来看，2019 年深圳高于苏州 2419.7 亿元，并且深圳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高达 777.8 亿元，三市比是 1:2.13:0.92。从 2010 年至 2019 年，深圳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达 5200 多亿元，十年间累计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高达 29442.72 亿元；而苏州十年来累计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14469.1 亿元，仅是深圳的二分之一。从居民个人收支情况看，深圳居民的财务状况也更好，但三市居民差距不是太大；

而从人均消费支出来看，深圳比苏州居民年平均多消费 0.77 万元，这一方面说明深圳的生活成本更高，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深圳居民消费意愿更强，三市相比苏州居民消费的意愿最小。

二、对三市发展差异的思考

通过对标我们看到，近年来苏州在三市经济发展的竞争中，与追赶的标杆城市深圳的经济发展差距仍在拉大，与一直关注的友邻城市杭州经济发展优势在逐渐缩小。

（一）对深圳成为创新之都的思考。近年来，深圳研发活动牢牢锁定在代表新一代工业革命的技术方向，紧盯通信与信息底层共性技术发展的乘数效应，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促使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智能制造、生物技术等科技成果在深圳开花结果，拥有了全球 5G 通信发展的话语权，抓住了信息产业发展的主动权，促进了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融合发展，拓展了经济发展的新空间，培养出了华为、中兴、比亚迪、华大基因、大疆等一批全球行业领先企业。

（二）对杭州成为电商之都的思考。杭州注重因地制宜，将山多地少、交通不便等不利于农业、工业发展的因素，转化为了信息交流频繁、经商意识敏锐的经济特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将产业发展集中在信息经济集群、文化创意、金融服务、旅游休闲、健康、时尚、高端装备互联网等领域与行业，培育出阿里巴巴、联科美讯生物医药、曹操专车、边锋网络等新经济企业，开辟了经济发展的新路径。过去十年间，杭州市第三产业增长速度明显超过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综合来看，杭州的研发活动更注重与自身优势与基础相结合，注重信息技术的运用性开发，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杭州的电商经济，其信息时代商业服务的特征极为显著。

（三）对苏州成为制造业之都的思考。苏州经济发展主要依托于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冶金、纺织、化工和轻工等工业生产领域，其中小型企业、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占较大比重。虽然培育了亨通、沙钢、波司登、盛虹等一批知名企业，也布局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纳米技术、人工智能等先导产业，但在信息革命来临之际，起步仍然偏晚、速度仍然偏慢，新经济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处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之中，经济现阶段仍然呈现出以工业化大生产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征。

•专家视点•

三、对苏州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对标找差重在借鉴，跟跑照抄永远落后。当前，苏州要在城市竞争中争先进位，不仅要练好内功，还要借好外力，为此，课题组针对以上对标与思考，提出以下几个方面建议。

（一）发挥自然禀赋特点，提高空间利用效率。进一步加强对土地空间的中长期规划，盘活土地存量，严格用途管制，同时注重由平面空间向立体空间拓展，进一步提高市域空间的利用率。做大产业生态圈，将劳动密集、附加值相对较低的产业向经济腹地转移，从市域内的产业链、供应链配套向区域内的产业链、供应链互补转变，以交通便利优势弥补空间资源的劣势。加快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地集聚，大力推动产业高端化，促进企业归核化，依靠创新链、价值链、产业链、要素链融合培育新兴先导产业，以掌握核心技术、核心环节、核心人才、核心装备来提高空间利用率和产业的利润率。不断挖掘经济发展的新空间，注重网络空间正在逐渐改造从农业、工业到服务业的产业组织方式，推动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的融合叠加。

（二）立足制造业优势，提升体系竞争能力。要注重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建设，调整外向型经济结构偏重的比例，紧盯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与持续扩大内需的潜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好扩大内需的大文章。要增强我市制造业对区域产业的控制力与影响力，强化“一区一业”战略，通过优势互补，协同互助，形成产业生态、创新生态的乘数效应，以体系优势确立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胜势。要把握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发展机遇，大力推进数字经济的发展，不断挖掘全社会的信息消费需求，不断提升信息时代聚集经济发展要素资源的能力，改善营商环境，

不断提升城市吸引力；锁定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新兴信息消费市场的培育与建设，推动产业由全向精，由量向质的攀升。

（三）抢抓新基建机遇，夯实信息化发展基础。新基建的目的就是加强信息时代的底层基础设施建设。苏州要抓住新一波互联网发展浪潮，把握新基建的契机，以 5G 与工业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为重点，实施一批新基建强市的重点引领工程，以工业互联网建设为起跳板，以 5G 和工业互联网的融合应用为重点，加快推进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促进资本和劳动密集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变。底层共性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是推动产业发展转型升级的关键。建议成立工业互联网建设与应用领导专班，建立数字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创新中心，在左右经济发展的底层技术、共性技术、关键技术、核心技术、高新技术上率先突破，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要加快制造业数字化改造，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体系，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业务模式新、发展态势好的高成长性企业，推动企业脱进入蓝海，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四）拓展人力资源腹地，深挖质量人口红利。人口数量是城市活力的体现，是一座城市吸引力与财富效应的标志。苏州要不断拓展人才腹地，保持人口规模和劳动力数量的优势，改善人口结构，减轻全社会抚养负担；要注重吸引中高端人才来苏就业，集聚高素质人才来苏创新创业，挖掘质量型人口红利。要下大力气发展智能制造，推进机器换人计划，优化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方向，构建与人口结构相适应的现代化社会经济体系。

（五）强化交通枢纽优势，推动陆港空港建设。苏州处于长三角核心区中承沪连宁、挽通接杭的十字路口，要把握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强化交通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建议依托苏南地区强大的制造业能力和苏州地理中枢的交通便利条件，在苏州城北区域内建设苏南货运陆港，固化苏州在长三角交通网络建设中的优势。苏州要进一步优化市域内交通布局，疏通堵点、解决难点、营造热点，建设以城际轨道、市郊铁路为主体的城际轨道交通网络，构建 70 到 100 公里的出行圈。以跳出苏州建苏州思路，促使苏州与长三角其他区域的经济从连接走向链接，提升苏州在区域经济中的辐射带动作用，下好将苏州建设成为网络节点城市和流量中枢城市的先手棋。在航空建设方面，在苏州机场建设还没有定论的背景下，建议以共建共享共赢的理念，进一步完善与上海虹桥、杭州萧山、南京禄口，特别是苏南国际机场的交通通畅衔接，同时把握航空业低迷的时机，迅速组建“苏州航空公司”（也可以是苏锡常三家共同组建苏南航空公司，苏州争取控股），并将苏南国际机场作为基地机场，争取苏州在航空运输方面的主动权。

（六）优化公共预算支出，借力一体化发展优势。苏州与深圳在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支出方面的差距短期内是无法弥补的。因此，苏州要进一步优化公共预算支出，集中力量办大事，以信息技术发展改善社会公共服务，重点加快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环保、智慧养老等公共服务建设，改善人居环境与公共服务质量。要把握长江经济带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苏锡常一体化建设、沪苏同城化等政策叠加的机遇，加强城市间公共服务建设的统筹协调，推动民生保障层面的资源共享，城市建设层面的互联互通，经济发展层面的互补共赢，科技创新层面的协同创新，以协调互补的一体化优势，弥补破解一般公共预算投入的不足。



• 专家视点 •

“环境美” 绽放绚丽价值色彩

方世南



导语

2020 年 07 月 21 日，“学习强国”江苏学习平台刊载东吴智库首席专家，苏州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方世南的观点文章《“环境美”绽放绚丽价值色彩》。文章指出，打造“环境美”新江苏是一个系统工程，并提出了打造“环境美”的若干方向。现将全文转载如下，以飨读者。

打造“环境美”新江苏是一个内涵丰富、意境深远和任务艰巨的系统工程，所追求的是由诸多价值目标组成的统一体——绿色产业转型的美丽经济，厚植文化根基的美丽人文，百姓共建共享的美丽生活，生态合作共治的美丽永续。江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美丽江苏建设作为一项事关全局的战略任务来推动，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以“美而富、美而文、美而舒、美而久”的多重价值色彩描绘出环境美的生动画卷，展现了“水韵江苏”之美、“新鱼米之乡”之美、城乡宜居之美。

一、美而富，以推进绿色转型打造美丽经济

为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江苏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将优化生态环境既当作发展的保障、也当作发展的内涵，自觉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制度化治理，把“大数据 + 网格化 + 铁脚板”机制全面运用到生态环境领域，积极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让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得益彰。

针对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加大等带来的困难和挑战，江苏着力构建绿色发展技术创新体系，着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着力创新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着力完善促进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努力把绿色产业打造成全省新的经济增长点，走出一条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以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促进“美而富”的江苏美丽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美而文，以厚植文化根基凸显美丽人文

近年来，江苏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生态文明建设与提升人文素养紧密结合起来，全面谋划部署生态文化工作，将生态文化建设作为创建生态示范市县的重要考核指标，深入挖掘生态人文资源，厚植生态文化根基，提升公民人文素养。大运河江苏段在持续提高水生态综合水平的同时，把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作为弘扬地域特色文化的重要载体，淮安打造“运河之都”、扬州做靓“运河原点”、无锡建设“江南水弄堂”、苏州再绘“姑苏繁华图”，持续推进大运河生态保护和文化遗产，让历经沧桑的千年运河风采依然。以生态文化与人文素养的交融之美，促进“美而文”的江苏美丽文化高质量发展。

三、美而舒，以百姓共建共享倡导美丽生活

江苏各地以生态环境高质量为目标导向，城乡统筹、一体发展、密切合作，努力消弭城乡之间的鸿沟，率先构建省域一体化发展新格局，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通过积极推进城市园林绿化转型升级，将丰富城市生物多样性、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性、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紧密结合，将园林建设成果普惠于民。通过“城市公园绿地十分钟服务圈”规划建设，均衡布局城市绿地，使居民能“遥望星空、看见青山、闻到花香”。以“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努力率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乡村振兴走在全国前列”

为目标定位，在打好农村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同时，摒弃传统高污染高耗能的发展方式，稳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以精心绣出生态城市与美丽乡村这一“东方双面绣”，促进“美而文”的江苏人民美丽生活高质量发展。

四、美而久，以生态合作共治推动美丽永续

江苏以永续发展观为指导，打破画地为牢和各自为政的简单做法，突破“造福一方”和“守土有责”的狭隘治理视界，坚持“造福八方”和“合作守土”的区域生态共同体整体联动理念，构建多元联动的跨区域生态合作治理机制，采取多元联动的跨区域生态合作治理行动，统筹推进区域生态优化发展、特色发展。长江南北坚持不搞大开发，共抓大保护。苏南和苏北一起做“加减乘除”，做好绿色发展的加法，做好齐抓共管系统治理的乘法，做好一切与生态环境优化相违背行为的减法和除法。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得到国家批复，成为淮河、大运河流域共同行动纲领，合力推动跨流域生态高质量发展。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推进生态合作共治，促进“美而久”的江苏美丽永续发展。

